

从“二分”到“总体”：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体系化建构

——基于唯物史观视域的综合考察

范雪倩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7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9日

摘 要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然而学界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长期侧重于物质性维度，致使精神生产力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亦存在被简化为单向决定论阐释的倾向。本文基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系统梳理，尝试提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物质 - 精神 - 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范畴：物质生产力构成其物质技术基础，精神生产力提供其智力动能与价值意涵，社会生产力则是二者在生产关系中介下的现实综合形态。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在劳动主体性的贯穿下，经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一个动态展开的有机整体。这一总体性理解或可为克服传统阐释提供另一种理论路径，也为完整把握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内涵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学理框架。

关键词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精神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唯物史观

From “Dichotomy” to “Totality”: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Xueqian Fan

Institute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文章引用：范雪倩. 从“二分”到“总体”：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体系化建构[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235-243.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83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eg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has long been oriented predominantly toward its material dimension, thereby obscur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imens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ve forces; moreover,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as tended to be reduced to a one-sided deterministic explana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Marx's classical tex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essentially a triadic totality of the material, the spiritual, and the social: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 its material-technological base, spiritual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 its intellectual impetus and value connotations, and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the real synthetic form of the first two as mediated 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se three are not merely juxtaposed; rather, permeated by the subjectivity of labor and driven by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y form a dynamically unfolding organic whole. This holistic understanding may offer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ranscending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s, and may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Marx,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Spiritual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生产力范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居于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经典表述，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被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2]。

长期以来，一种较为通行的理解倾向于将生产力等同于物质生产力，将其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这种理解在教科书中获得了较为系统的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这种“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被抽象化为一种脱离现实生产活动的纯粹公式时，生产力理论便可能失去其具体的、历史的内涵。这一困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对生产力范畴本身的理解有关，如果生产力仅仅被理解为物质力量，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便只能在物质力量与社会形式之间展开，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特别是精神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便难以得到恰当的说明。

马克思本人对生产力的理解远比这种阐释更为丰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3]中，马克思明确使用了“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并列提法，将二者共同视为货币所推动发展的对象。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4]及其手稿中对科学、知识、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对协作、分工所形成的社会力量的分析，以及对劳动主体性的强调，都指向一个多维度的生产力概念。

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中，马克思主要从哲学人类学出发，将生产力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批判焦点在于异化劳动条件下生产力的丧失。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6]，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奠基，从分工与交往形式出发考察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条件，此时“生产力”更多与“交往形式”相对而言，尚未展开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3]和《资本论》[4]中，马克思则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生产力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结构分析，区分了“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的一般生产力”等不同层次。这种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早期论述的失效，而是表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理解随着研究对象的展开而不断深化。因此，将“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视为并列范畴，并非马克思一以贯之的现成结论，而是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理论任务所作的理论建构。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一种系统化的梳理与重构。具体而言，本文尝试论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精神—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范畴，三者分别构成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精神智力条件和社会实现形式，并通过劳动主体性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一阐释思路试图在文本依据的基础上，为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内涵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

2. 生产力的双重维度：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2.1. 物质生产力：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探讨始终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物质生产力首先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改造自然、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7], p. 59)，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

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7], p. 215)。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将自然物质转化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因此，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首先表现为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 p. 204)。就“测量器”的功能而言，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指示器”的功能而言，劳动资料不仅是一种技术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同的劳动资料不仅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效率，也规定了不同的社会结合方式。

然而，将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严重窄化。“物质资料的生产并不能代表整体社会，尽管物质资料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生产者及生产者的精神品质也将对生产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9]。“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二分，并非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最终形态，而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2. 精神生产力：从被遮蔽的维度到独立的范畴

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著作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晰化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中，马克思虽然尚未明确提出“精神生产”范畴，但已隐含地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视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在《神圣家族》[1]中，马克思首次使用了“精神生产”概念，并将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价值都归结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6]，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系统揭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他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10], p. 524)，精神生产只有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

的时候” ([11], p. 35)才获得独立的形态。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3]中, 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精神生产力”概念, 将其与“物质生产力”作为并列的范畴加以使用。

精神生产力是精神生产者运用精神生产手段、作用于精神生产对象、创造出精神产品并用以改造世界的能力[12]。“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 通过知识、技术、艺术、科学等形式得以体现” [13]。第一是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者主要是指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及其结构、专门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脑力劳动者。精神生产者的知识水平、创造能力和价值取向, 直接决定着精神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与高度。第二是精神生产手段。精神生产手段是指精神生产者在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工具的总和。精神生产手段的发展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精神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第三是精神生产对象。精神生产对象是指精神生产者运用精神生产手段进行加工改造的精神性材料。它与物质生产对象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 物质生产对象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会被消耗或耗损, 而精神生产对象则具有累积性和传承性。前人的精神成果构成后人精神生产的前提和材料。

2.3. 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内在关联

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并非各自独立运作的两个系统, 而是处于深刻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之中。

一方面, 物质生产力构成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以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水平为前提” ([14], p. 505),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明提供课题与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 ([15], p. 572)。物质生产所提供的工具、设备和实验条件, 是精神生产活动得以展开的物质前提。

另一方面, 精神生产力作为“一般生产力”, 必须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发挥实际作用。这种转化通过两条途径实现: 一是将科学知识物化到劳动资料中[16]。马克思在分析机器体系时指出: “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 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17], p. 219)科学知识通过发明创造被物化在劳动资料之中, 使自然力服务于人类的需要,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的效率。在此意义上, 机器不过是被赋予了科学知识的自然物质。二是将科学技术传授给直接劳动者[16], 提升其劳动技能。当科学技术被广大劳动者所掌握, 精神生产力便转化为千百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现实力量。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表明, 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 社会生产力: 物质与精神在矛盾运动中的社会形式

将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基础 - 反作用”或“手段 - 目的”的单向模式, 仍然是不够的。二者的统一, 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 即社会生产力的层面, 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3.1. 从个体劳动到社会劳动: 生产力的社会性生成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理解有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 生产力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能力的简单加总, 而是在人们的“共同活动”中生成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在批判“鲁滨逊式的个人”这一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虚构时, 实际上揭示了生产力本质上的社会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6]中明确指出: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 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11], p. 33)这一界定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涵: 生产力不能被理解为外在于人的物质力量, 而应从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出发来理解。换言之, 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 它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也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社会性生成经历了从劳动过程向社会过程的转变。在工场手工业阶段, 分工与协作使生产力成

倍增加。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体系使生产过程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 ([14], p. 356)。此时，不仅个人的生产力被整合为社会的生产力，而且“科学的力量”都汇聚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态。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就是以群体协作的形式进行的。单个的人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只有通过联合与协作，人类才能实现对自然的改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协作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从简单的自然分工到复杂的社会分工，从个体劳动到工场手工业中的协作，再到机器大工业中的社会化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与人结合方式的变革。

3.2.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的一般生产力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进一步区分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的一般生产力”两个层次，这一区分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生产力内在结构的理解。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指的是通过协作、分工、工厂制度等社会劳动形式而“无偿”产生的那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 ([15], p. 363)。协作能够创造一种“集体力”，这种力量比单个人力量的简单加总要大得多。分工则通过劳动的专业化和劳动的连续化，使生产力成倍数增加。工厂制度则通过机器体系将生产过程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进一步放大了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增加资本家的任何额外成本，却能够使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因而被马克思称为“不费分文”的生产力。

劳动的一般生产力主要指科学和自然力。当机器体系将自然科学系统地应用于生产过程时，“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 ([15], p. 363)。科学的应用使生产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种转化中，自然力不再仅仅是外在于人类生产的环境条件，而是被有意识地纳入生产过程中，成为社会劳动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还是劳动的一般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它们被资本无偿占有，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力量。

3.3. 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对这一关系的理解，需要超越简单的“决定-反作用”公式，深入分析二者之间内在的、互构的关联。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 ([10], p. 724)。这意味着，生产力从来不是“赤裸裸”地发挥作用的，它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运行。同样的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形成和变革的最终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18], p. 591)。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具有一种“刚性”约束力：它既规定了某种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上限，也规定了某种新的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基本框架。

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动态互动中，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形态。物质生产力提供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基础，精神生产力提供了智力创新和价值引领，而二者的统一，即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的生产力，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得以实现。脱离生产关系来谈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不全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4. 劳动主体性：贯穿生产力总体性的内在尺度

4.1. 劳动主体性与生产力的内在关联

贯穿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总体性的，是劳动的主体性维度。马克思指出，“生

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 ([8], p. 59)。这一命题的深刻之处在于：生产力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物质力量，而是在人的劳动中生成、并通过人的劳动发挥作用的能动力量。

马克思对劳动主体性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中，劳动主体性主要是在异化理论的框架内被讨论的，这一论述带有明显的哲学人类学色彩。而在《资本论》[4]中，马克思则从劳动过程的客观要素出发，分析劳动如何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如何使“死的物质”重新获得生命。此时，劳动主体性不再仅仅是一个价值批判的范畴，而同时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在环节。这种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使劳动主体性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

“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具有本体论的地位。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10], p. 531)，而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劳动。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在劳动中，人不仅改变着外部自然，也改变着自身的自然。通过劳动，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即在外部的世界中实现自身、确认自身。正是由于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才内在地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因素。任何生产力都是人的生产力，它不仅表现为人能够“做什么”，也表现为人“如何做”以及“为谁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既取决于客观的物质条件，也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力、创造精神和价值取向。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也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自主活动空间的扩展。

4.2. 主体性在生产力三个维度中的展开

在物质生产力的层面，劳动主体性体现为劳动者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改造自然物的能动活动。离开了活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过是“死的物质”。只有活劳动才能“使它们由死复生”，使潜在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即使在最物质化的生产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仍然是生产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精神生产力的层面，劳动主体性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精神生产者运用智力、知识和创造力进行精神产品的创造，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能力的高度发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艺术创作、理论建构——这些精神生产活动不仅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而且反过来塑造着人的意识和人的世界。精神生产力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理论、技术方案、价值观念等，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作用，更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

在社会生产力的层面，劳动主体性体现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所创造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既不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也不是脱离个人的抽象力量，而是在人们的交往、协作、竞争中生成的、以个人能力为基础又超越个人能力的新型力量。生产力的成倍增长正是社会主体性的产物，它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结合，而非来自物质要素的单纯堆积。

4.3. 异化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尺度

生产力的发展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又可能成为奴役人的力量。这一悖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这一悖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10], p. 159)。造成异化的原因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劳动的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的一般生产力都被资本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成为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的力量。

这一异化状况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深刻张力。生产力的发展本应是解放人的力量，

它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却加深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它提高剩余价值率，使资本积累加速进行。马克思将这一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走出这一困境的根本路径，不在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变革阻碍劳动主体性充分实现的生产关系。“只有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驾驭被资本唤起的自然与社会的合力时，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其本真的历史使命”[19]。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尺度不是单纯的数量增长，而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 p. 189)。

5. 总体性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展开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精神－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范畴。这一总体性理解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当代阐释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5.1. 生产力总体性范畴的理论定位

物质生产力构成其物质技术基础，精神生产力提供其智力动能与价值源泉，社会生产力则是二者在生产关系中中介下的现实综合形态。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在劳动主体性的贯穿下，经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一个动态展开的有机整体。这一总体性理解具有三重阐释意义：其一，对生产力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物质性维度，忽视精神生产力维度，不仅会导致对马克思文本的片面理解，也无法恰当地说明科学、知识、文化等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其二，有助于克服传统阐释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机械割裂或外部碰撞式理解，将二者的互动把握为生产力各维度在生产关系中的整合与展开过程；其三，为理解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框架性思路，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物质技术、精神智力与社会形式三者矛盾运动中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总体过程，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理解偏差。

5.2. 生产力三重维度的当代重塑

若将“物质－精神－社会”三位一体框架用于当代，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并非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例外”，而是其总体性结构在更高社会化程度上的新展开。“在今天的数字媒介时代，生产力三要素的表现形式，虽然与马克思所处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的三要素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一定意义上，它创新性地丰富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内涵”[20]。

在物质生产力层面，数据、算力、算法和平台基础设施构成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数据中心、芯片与能源消耗表明，数字生产力仍以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为前提。在精神生产力层面，人工智能将知识、语言和认知劳动凝结为可计算、可复用的技术系统，使精神生产获得物质化形态；然而训练数据、标注劳动和算法设计仍受资本逻辑与平台权力筛选，智能并非价值中立。在社会生产力层面，平台通过网络效应、实时协作和用户生成内容，把分散个体活动整合为巨大社会协作力，却常以数据垄断、算法管理和平台依附形式被私人占有。当代数字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深刻重塑了物质、精神与社会三重维度的关系。

5.3. 生产力当代发展的总体性审视

数字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双重效应。“当数字生产力发生变化，建立于其上的生产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全面而深刻的数字化变革”[21]。一方面，数字劳动、算法控制和数据剥夺构成新的异化：经验与交往被转化为可提取数据，精神创造力被平台规则规训，社会协作力表现为平台支配力。另一方面，数字化与智能化也拓展了解放可能：它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促进知识共享与全球协作，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数据、算法和智能设施提供物质条件。技术并不自动导致解放；只有当生产关系使数字生产力

从资本增殖工具转化为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时，生产力发展才真正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当代审视表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总体性框架并未过时，而是要求我们在新的物质、精神与社会关系中继续追问生产力“为谁发展、由谁控制、何以解放”。

在数字文明的时代背景下，重估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总体性特征，不仅具有文本阐释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回应时代之问的理论潜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所蕴含的辩证智慧——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发展与价值的统一，为我们完整理解生产力的本质及其历史展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理解生产力的完整面貌，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文本的深处，重新发现其丰富内涵。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实践”(2026ZZTS0439);
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审视”(2025ZZTS0369)。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2] 赵华灵.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嬗变与唯物史观的形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1): 37-41.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8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9] 庄惠惠.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现实意义[J]. 人民论坛, 2017(26): 112-113.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12] 王丽娟, 刘同舫. 精神生产力: 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范畴[J]. 天府新论, 2011(5): 22-26+45.
- [13] 钟平玉. 精神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分析[J]. 经济学家, 2025(10): 25-34.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6] 马仲良, 韩长霞. 马克思论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J]. 哲学研究, 1998(8): 3-9.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9] 韩志伟, 刘姝好. 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三重意蕴及其当代意义——从《评李斯特》谈起[J]. 山东社会科学,

2026(1): 57-66.

- [20] 熊亮. 数字媒介时代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创新认知[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4): 94-103.
- [21] 李韵, 陈尧. 算法驱动数字生产力跃迁与生产关系变革研究[J]. 经济学家, 2026(1): 37-46.